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丙种 第肆拾玖部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国博



家和年丰

猪年生肖文化展
Harmony and Good Harvest:
Celebrat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the Year of the Pig

首都博物馆 编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首都博物馆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定价：68.00元



猪年生肖文化展

Harmony and Good Harvest:

Celebrat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the Year of the Pig

◎ 首都博物馆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Harmony and Good Harvest: Celebrat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the Year of the Pig

总策划、出品人：白 杰

总 监 制：韩战明 杨文英

监 制：吴 明 谭晓玲

责 任 人：魏宇澄 王 俊

内 容 撰 写：郑 好

展 陈 设 计：李光远

文 物 管 理：王显国 刘 丞 李 兵 闫 娟 韩 冰
于力凡 王丹青 柳 彤 胡 昱 徐 亮

灯 光 师：索经令 吕 欧

摄 影 师：梁 刚 谷中秀 张京虎 朴 识

图 片 编 辑：白 琳 韩 晓 杨 妍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100045

16 Fuxingmenwai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45,
P. R. China

中文网站：<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English website：<http://en.capitalmuseum.org.cn>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新年贺词

“斗柄回寅天下春”，大家专注各自领域的深耕细作，又换来“田增五谷人增岁”。今年是农历己亥猪年，猪在民俗文化中是丰饶、富贵的象征，肥猪拱门，衷心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诸事大吉、家和万事兴！

鼠为生肖首、猪为六畜先，2008年起，首都博物馆连续十二年开展以生肖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打造春节文化盛宴。今年正值生肖轮回的圆满己亥猪年，展览选取了我馆六十组件馆藏文物，通过文物、图片、文字说明、场景互动、多媒体播放等多种方式，向观众展示中国历史中多维度的猪文化。中国人最重亲情和团圆，家是本源的寄托和情感的凝结。近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对猪的驯养和利用与“家”的形成密切相关。猪是我国古代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是定居农业的标志，也是我们的祖先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开端。展览将呈现农业文明背景下，猪与古代人类的互动关系和观念变迁。小说和电视剧《西游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猪八戒的角色塑造深入人心，我们挑选了馆藏文物中以小说《西游记》为蓝本的珍贵画册，与观众共飨经典。

生肖文化将时间、生命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文化符号。亥猪作为时间和生命循环周期的界点，是周期循环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今年的生肖展将为我馆十二年来开展以生肖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收官，您是否记得这些伴随我们迎来十二个新春的展览？诚邀您和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共襄盛典！

首都博物馆
党委书记 白杰
馆长 韩战明
2019年1月



目 录

01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策展札记

07 前言

09 第一单元 生生不息

31 第二单元 风调雨顺

45 第三单元 岁岁今朝

57 结语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策展札记

郑好

笔者是癸亥年生人，策划己亥猪年生肖展，大概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中国人讲“命”，离不开生肖，生肖文化扎根生活，两千年来与生命共同演化，它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发展。

猪是我们熟悉的动物，赓续万年前被驯化的初衷，它一直是传统礼仪中慎终追远、宴飨速宾的首选，用什么方式向观众解读猪的文化和不为人知的故事？“家”字给予笔者豁然开朗的灵感，它是猪和人紧密关系最直接的见证。汉字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载体，固化着最富人文情怀的史实。从数千年前被拘驯开始，六畜中犬、牛、羊都曾“寄于屋下”（甲骨文匸¹），而唯有“豕于屋下”成为“家”的会意。“家”对每个中国人都意义非凡，尤其是年终岁末更具仪式感的团圆时分。猪是农家宝，是瑞兆丰年的象征。上古神话中的当康大穰和民间传说中的肥猪拱门，都是农业文明积淀中对新年最美好的祝愿！猪是水畜，古人对猪和水的关系如此深邃复杂的理解和关联想象令笔者惊叹不已，而在这样的思维意识背后仍然是追寻循环生息的哲学观念和人们对物阜民丰的美好生活渴望和实践。于是，笔者希望通过猪在“家和”和“年丰”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的文化遗存和文化现象呈现它在生肖中的独特气质，和它带给人们的最质朴的新年展望！

一、现象与抽象

生肖纪年的基础是古人对时间的认知和记录。千年之前朱熹与蔡季通探求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于何书。先辈贤人们努力通过多个视角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角度多元、莫衷一是。猪与亥对应的解释有：“亥为豕，与豕同”，二者字形和意义相通；以收藏万物的“亥”作为十二支循环历程的收尾和母猪与大地母亲相认同的神话观念吻合²；亥时天地混沌一体，与猪吃吃睡睡的浑浑噩噩相应等等。这些观点解读对于脱离历史语境，在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飞速增长的环境中成长的当下观众来说，并不容易理解和接受。展览试图客观呈现与猪相关的文物和文化现象，让观众沉浸在猪与人关系的发展脉络和多元角度中，开放地、自主地感受猪对人的意义和它成为生年之肖的可能原因。

猪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已有3600万年的历史，比人类更加古老。古代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留下了许多与猪相关的文化遗存和文化现象。考古学家在广西桂林甑皮岩下层和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中都发现了家猪骨骼，距今约9000年上下，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³；山东胶州三里河出土的陶猪鬶

反映出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居民的实用和审美态度；自磁山文化兴起的葬猪风习沿至大汶口文化期，成为先民的普遍葬制，而墓葬出土的猪的下颌骨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红山文化典型的大耳圆眼猪首玉玦和头披刚劲猪鬣的C形玉龙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心中龙的形象；商代早期遗址祭祀区中猪是数量最多的牺牲，是对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的延续；汉代时兴厚葬，模型明器中普遍配置陶猪圈、陶猪，部分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使用雕刻手法凝练的玉握猪随葬，画像砖石墓内描绘的场景中有庖厨宴饮图和虎猪戏；佛教密宗位列天部的护法摩利支佛母“猪面利牙外出”；道教的斗姆元君乘坐七猪车等。古籍中，《山海经》里的司彘之国在“流沙之东，黑水之西”，黄帝之孙、颛顼之父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肢、豚止”⁴，与猪一般模样，《中山经》《东山经》《南山经》里有诸多“豕身人面”“彘身人首”的山神；庄周在《大宗师》里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的“道”必须借助豨韦氏以掣天地；小说《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本是理天司斗的天蓬元帅，“敕封元帅管天河，总督水兵称宪节”。而猪同下雨的关联简直是数千年前古人对“大数据”传奇般的收集和运用：《周易·睽卦上九爻辞》描写上古迎亲队伍在路上“见豕负涂”，结果遇到下雨；《诗·小雅·渐渐之石》将“有豕白蹢”同“月离于毕”并列为大雨征候；甲骨卜辞里，以“六豕，卯六羊”配祀“六云”⁵以祈雨；《山海经·东山经》的合窳“状如彘而人面”“见则天下大水”；敦煌莫高窟二四九窟窟顶西坡西魏壁画传神地描绘出猪模样的雨神⁶。

这些信息让笔者意识到猪与人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这可能与人类早期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紧密交织相关。就像通过文献探究古代中国大地上的猪到底是黑色还是白色，是“乌鬼”“乌金”“黑面郎”更具代表性，还是“辽东白豕”见识浅陋，难得端绪。于是从挖掘猪和人类关系的完整性、意义的延续性出发，整理碎片化的文化现象，从物质性和精神性层面提炼猪与人关系的黏着性和闪光点。展览通过对文物和文化现象中猪形象写实与抽象的转化和解读，让观众了解猪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的复合角色，和它在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中给予人的满足和慰藉。这些文化积淀构成了猪抽象为生肖符号的基本面。

二、多元与统一

1. 自然的选择

展览开篇直接呈现对猪有意识的驯养与人类发展阶段变迁的辩证关系。大约11000年前的气候剧变，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活动缓慢而深远的改变。耕种活动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人类第一次摆脱对自然产物的绝对依赖，安定下来，种植谷物、驯养动物，开拓自身的发展路径。相对于猪和其它动物形



象——“十二禽”明确与地支的系统对应和应用为生年属相这样的抽象观念形成，它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已经积淀了数千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猪承载起人们多元甚至冲突的观念和想象。

生肖中的猪是家猪，它由野猪驯养而来。未经驯化的野猪一方面是民害，《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㺄、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⁷另一方面，它是衡量勇敢的标志。“事”“敢”“逐”曾是先秦狩猎围绕捕猪活动展示勇武有力的描绘；更不用说以“彘”⁸为人名寄托勇猛自信的神气。即便是驯养之后，不刻意去势，家猪仍然能呈现出髹甲隆起、鬃鬣高耸、獠牙外露的威猛气质，唐代的仿生陶猪、石猪、陶生肖猪俑尤其能传达出属于时代的显著偏好，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文化对生肖猪的选择。

猪曾是定居生活中最重要的家畜，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人类社会控制了自己的食物补给，可靠的肉食来源使得人类的体质增强，也大大增强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说是人类生存迭代中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猪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凌家滩出土的玉鹰，都显示出猪超越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对聚落“上层建筑”的象征和人与天地关系的理解。这可能与农业生产对精准时间的依赖相关。古代人类对时空的构建，从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⁹的观照开始。我们的祖先通过“观象授时”确定农时，在对特定星区的星宿进行观测的同时赋予它们动物象形的梦想，比如早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遗址就发现了蚌塑龙虎组成的“星象图”。猪与星象的关联也在文物和文献证据中显露端倪，比如“斗星时散精为彘”就建立起对人们构建中观维度的时间观念非常重要的北斗星与猪的关联¹⁰，凌家滩出土的玉鹰或许正是金乌不仅能“负日”还能“负星”的实证。气象条件更是影响食物稳定来源的重要因素。“龙见而雩”¹¹，东宫苍龙星宿，昏见东方，万物始盛，此时祭天，为百谷祈雨。而古谚曰“猪乃龙象”，是不是将猪与下雨的关联，同星象的再度连接呢？“奎曰封豕，为沟渎”¹²，奎星是“天之府库”，与之遥相呼应的猪能主宰大地上的沟渠灌溉，成为农业丰收和财富的象征，直到今天猪造型的器皿也往往作存储器用；“奎主文章，仓颉效象”的信仰也至迟在东汉形成，奎星的屈曲相钩如同文字之画，以奎称文，经过民俗的演绎，使猪成为莘莘学子金榜题名的守护。饮食是人类生存、繁衍最基本的要素，世界各地都形成了一套以食物和天象之神为中心的世界观¹³，人们认为必须通过持续的祭祀和祈祷，才能保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往往成为沟通天地的媒介和精神活动的主角。

拘驯之后，给猪去势，它的性格就变得驯顺，身体也更加膘肥圆润，《周易·大畜》说“豮豕之牙，吉”。驯养的方式也从散养转变成更易积肥长肉的圈养。《齐民要术》：“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农政全书》：“猪多，总设一

大圈，细分为小圈，每小圈止（只）容一猪，使不得闹转，则易长也。”指出通过刻意限制猪的行动，来定向培养猪的性状。秦汉时代牛耕普及，猪在农业生产上不如牛，在战场上不如马，地位明显下降，加上驯化后多被去势，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对猪的崇拜逐渐淡化消逝。圈养的方式把厕所和猪圈结合在一起，使猪以残弃、人秽为食为舍，渐渐与“不净”“蠢笨”的负面评价关联起来。到生肖的传说故事中竟形成“无用蠢材，颠倒黑白。罚去吃屎，一年一宰”¹⁴的叙事和评价。以致笔者为丰富展览寻找图像素材，不仅受到“猪不入画”的普遍限制，就连农事题材也避之不画。幸觅得杨柳青年画“新年多吉庆、合家乐安然”，画面中心的“肥猪拱门”为聚宴祝岁倍添吉祥、喜庆！

“蠢笨”“不净”之物，怎可敬献给祖先神灵？猪和玉器是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夏商西周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¹⁵孔颖达疏：“豕肥则毛鬣刚大也。”《淮南子·汜论》云：“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高诱注：“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西周春秋之后，畜牧业有所发展，祭祀有了“少牢”和“太牢”两种规格¹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牢意牲畜圈，猪、牛、羊三牲具备为太牢，猪、羊具备为少牢。从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俗风情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到满清宫廷的祭祀仪式，猪都是最理想的祭品。

以物比德、砥砺人格是理解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小说和电视剧《西游记》是陪伴几代中国人成长的经典。我们最熟悉的猪八戒是集矛盾于一身的角色。他愚笨、懒惰、贪吃、好色，又勇敢、敦厚、忠诚、坚忍，诙谐幽默又尽显真性情，是神话角色对人性的比兴。唐僧师徒为求得真经，克服艰难险阻，经历和精神至今为人赞颂。经典的流传与角色的塑造，是对文化弥漫发展的凝练。

“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¹⁷的理想，正随着人类处理、调和不同阶段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动态变化，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是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目标和历程。

2. 融通的生肖

从猪与星象的关联不难理解它何以成为时兽。如果说金鸡报晓因而知“晨时”是微观的“天”时，那猪与北斗和星宿的关联则是中观维度四季年轮的演进，“斗柄指亥天下冬”。时兽与地支的对应，让时间刻度有了鲜活的表征，也让生肖融入了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和古代哲学体系。

现代物理学认识到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开和独立于空间，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时空的客体。早在战国时，尸佼就提出过“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时空见解¹⁸。集古代时空智慧的生肖既是时间的符号也表征方位。指示南北方向的子午线用十二支中的两支作为方位标志。历史上，北京城地安门桥西石栏上雕

刻的二鼠，隔着紫禁城，与正阳门迤西的石马遥遥相望¹⁹，连成子午线。卯兔和酉鸡，不仅是太阳和月亮升落的天门，也是正东、正西的标志。子午、卯酉在《淮南子·天文》中称为“二绳”，经天纬地撑起方位系统。观天文知地理，斗转星移、寒暑更迭、草木枯荣、播种收获。

如果把“一个人有一个，全国十二亿人只有十二个”的谜面放到搜索引擎，大概会集中得到生肖和星座两个跟我们生命相关的谜底。生肖依托于干支纪年的历法系统，星座采用了与黄道十二宫相同的名称。前者依托古人对以二十八星宿为背景的岁星视运动的系统观测和转化演变，以年为时间刻度；后者则是直接对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观测和模拟划分，以月为时间刻度，尽管是中西天文学两个不同的体系，但对日月和五星观测的意识、理念和记录方法异曲同工。黄道十二宫的传入，以隋代耶连提耶舍译的《大乘大方等目藏经》中出现的十二宫名为最早。宣化辽墓中的星象图就同时包含二十八星宿和黄道十二宫系统，有的还融入了十二生肖，以独特的文化面貌和艺术风格揭示了墓主人所属时代极高的天文水平和复杂的宇宙观。壁画呈现出黄道十二宫同十二生肖的对应关系，子鼠对宝瓶、丑牛对摩羯、寅虎对人马、卯兔对天蝎、辰龙对天秤、巳蛇对室女、午马对狮子、未羊对巨蟹、申猴对双子、酉鸡对金牛、戌狗对白羊、亥猪对双鱼。

生肖之所以能经久不息的传播，除了生动好记的形象外，纳入以周易、五行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以“命运”的形式与人的生命相连可能是重要原因。生肖与周易八卦对应，反映古代哲学思想中阴阳消长、对立统一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把人与自然、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五行学说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解构世界，五行相生相克，推动天地之间万物运转变化，人置身其中，活动机制受其影响和作用。在生肖壁画、生肖镜、镜形摆件等载体中保留着生肖、八卦、五行、四神、二十八宿配合形成的多层次符号系统，奥秘深藏，其中包含的谶纬、卜算随科学和理性认知的发展而被摒弃，而传统文化中探索协调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寻求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的理念仍然闪烁智慧的光芒。

三、发展与创新

在不可获知地球自转一周为昼夜，和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是一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如何面对天空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之顺逆。”²⁰他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和运行规律，建立起时空联结，制定纪时法则，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并以此为基础，把每一个人的出生同日月星辰的运动和世间万物的作用联系起来，以生动的动物形象寄予对未知生命的渴望和理想。而数千年后的今天，运用天体力学方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出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中古代天象记录发生的确切年代已经实现，

帮助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人类从仰望到迈步星空，探索存在和生命的意义，古老而年轻！

生肖依托古人对时空的认知产生和完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共同想象，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运用之初，它赋予时间生动的表征，寄寓人探索自然和生命的思考和总结，它的内涵随人类认识自然、探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的关系中不断变化。围绕生肖产生了丰富的民间习俗、审美风尚、择吉偏好，使生肖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影响力和教化功能，具有独特的传播价值。生肖文化是了解传统文化和年节习俗的切入点，对于发掘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有重要意义。

生肖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特征，万物一理贯通。它与周易八卦、阴阳五行等蕴含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结合融通，转化成普通百姓看待人与人、人与天地之间深刻互动的生动方式，阴阳消长、刚柔并济、循环平衡、和谐圆满。尽管农业文明尚属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初级阶段，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还没有充分开发和调动，寻求人和自然的平衡只能算是被动平衡，但这种理念探索和孜孜追求，是我们今天主动、能动、自信地实践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动态平衡的历史根基，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整体思维的文化基因从三千年前“天人合一”的创建，迭代创新到今天走“生态文明”之路，思想之光历久弥新！

是为记。

-
1.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6页、第187页。
 2. 叶舒宪：《亥日人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3.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4. 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第十八卷《海内外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3页。
 5. 沈建华：《从〈菁华〉大版卜辞看商人风俗与信仰》，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5页。
 6.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的艺术宝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21。
 7.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9页。
 8. 《汉武故事》“景帝梦高祖”后，给汉武帝取名为“彘”。汉武帝麾下左将军名荀彘。春秋时晋大夫先縠号“彘子”。刘邦麾下一名大将叫陈豨。
 9. 郭璞译注：《周易·系辞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80页。
 10.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5—159页。
 1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页。
 12. [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57页。
 13. [英]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14. 叶舒宪：《亥日人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14页。
 15. [汉]郑玄注：《礼记·曲礼》，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页。
 16. 刘晔原、郑惠坚：《中国古代的祭祀》，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第12页。
 17. 安小兰译注：《荀子·王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1—92页。
 18.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7页。
 19. 吴裕成：《生肖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20. [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70页。

前
言

家
和
年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是亿万中国人心灵相通的约定。数十亿人次的迁徙绘就成中国大地上团圆美满的动人图卷，兑现着中国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传承，感召着我们民族内生的强大凝聚力！而这场岁时仪式的核心“家”里还有一位“成员”——豕。有豕才有“家”，标志着古代人类从迁徙走向定居的生产经济形态，开启播种、耕耘，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代代传承。猪作为时兽与地支中的亥对应，标志着岁月轮回的圆满，预示着蓄势待发的启程，恰如我们在年节时分回归本源的真谛！

卷之三

生生不息

什么是家？“家”字在甲骨文中写作龕，从字形上看，房屋里有一头猪，表示豢养猪畜的稳定居所，是人类经历迁徙走向定居，生活安宁、富足的见证。有学者根据殷墟卜辞“其侑报于上甲家”、“飨父庚、父甲家”等的线索，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家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是“宗庙”，“飨大高者，彘为上牲”。还有学者认为“家”通“嘉”，以“嘉礼”（婚姻）为本，正如猪的多子，繁衍兴旺才是家。“家”字是农耕社会中人们生产、生活多维度的写照，是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家庭、家族、国家大事的经典描绘。猪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平凡生活中的物质基础、财富标志，是祭奠仪式中寄予情感和希望的圣洁牺牲，是家庭、家族凝聚亲情、延续传承的寄寓和象征。

一、有豕有家

生肖猪是家猪。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来。新石器时代，人工种植黍稷和稻麦等作物的出现以及定居聚落的稳定，为家畜饲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前仰韶时期（距今9000年—7000年），家猪饲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渐已出现，猪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畜。《淮南子·本经训》有“拘兽以为畜”的记载，可以推测，古代人类在不断接触野猪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野猪的生活习性，开始对它们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喂养和繁殖，跨越数千年的漫长过程，逐渐把它们驯化成理想的模样。而人类在进行猪的豢养、利用的同时也成就着自身的发展、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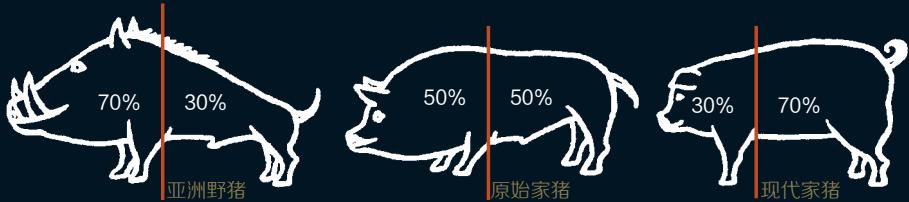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猪下颌骨

猪是我国驯养最早的家畜之一。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就有家猪骨骼标本出土，年代可早至距今9000年左右，是目前可确认的国内年代最早的家庭猪。而这件家猪标本发生的齿列扭曲的骨骼形态变化需要较长时期的积累，这表明我国家猪驯化的时间还可以往更早追溯。地域上，南起甑皮岩北到兴隆洼，西自仰韶东到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猪骨出土，呈现出本土多中心的起源模式。

1. 驯化——从野猪到家猪

一般认为，大部分地区驯化的动机是为了获取肉食。以中原地区为例，在猪类驯化出现之后，从距今10000年至7000年间，猪在肉食构成中的贡献率由平均10%剧增至70%左右，比例明显增加。直到今天，国民的这项消费数据仍然维持在60%左右。也有认为家畜驯化是基于宗教祭祀的需要。《左传·恒公六年》疏：“畜牲一物，养之则为畜，用之则为牲。”《周礼·天官》中也有相似记载。

距今10000年—9000年(距今，距1950年)，猪和狗驯化于中国北方；距今约10000年，黄牛和羊最早驯化于西亚地区，距今5000年前传入中国；距今约5500年驯化的马出现在中亚地区，在夏商时期传入中国；鸡的起源问题争议较大，在距今3600年之前出现在中国北方。汉代之前，六畜已成为中国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资源。



野猪到家猪身体比例变化示意图

野猪为了适应生存、抵御外敌，神经系统、心肺器官发达，头部和前躯大，又经常掘食用植物根茎，吻部前突、獠牙锋利，中躯体幅狭窄，后躯瘦削，鬃甲明显高于臀部；而培育家猪主要是食用，最有价值的是肉，家猪前躯缩小，背线平直，中躯宽圆，后躯显著丰满。

红陶猪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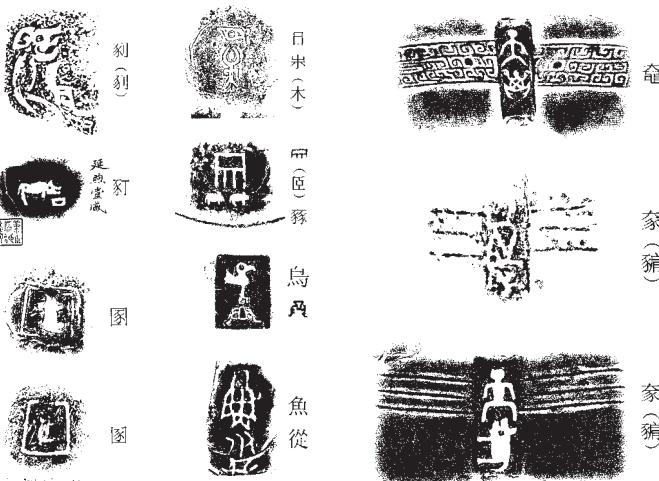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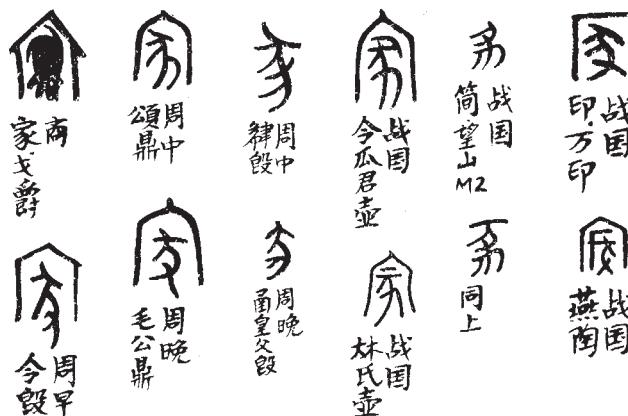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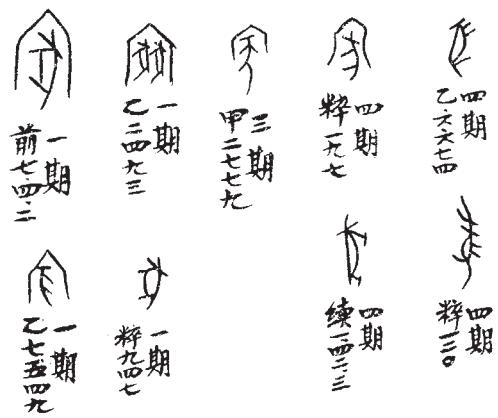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7000年—6000年）

残长约8厘米

北京市平谷上宅遗址出土

◎ 上宅遗址属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萌芽状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仿生陶猪的獠牙已经很小，吻部也变短，更多地表现出家猪的特点。猪形陶器的发现反映出原始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发生。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猪”和“家”

“豕”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铭文中就已经出现，是三代时表示猪的文字。

2. 饲养方式——放牧与豢养

古人如何养猪？

古人很早就有按照食物类别划分家畜的意识：牛和羊食草，“草养曰刍”；猪和狗吃粮食，“谷养曰豢”。《说文解字》：“豢，以谷圈养豕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反映出上古时已经采用圈养和放牧结合的形式养猪。反映春秋战国吴越地方史的《越绝书》载，“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可见牧场规模之大。《史记·货殖列传》称“泽中千足彘”的人家“与千户侯等”。“泽中”是牧猪的理想地

点，“千足彘”约二百五十头的规模，规模化的养猪业态必定需要雇佣放牧人。汉代的公孙弘、吴祐、孙期、梁鸿、承宫等都曾以“牧豕”为业，“牧豕听经”成为千古佳话。唐代诗人王绩在《田家》中描写“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的田园生活。《齐民要术》记载，“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的生产经验。

铜簋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通高22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7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黄土坡墓地出土

◎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遵循列鼎制度，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器内底铸有阴文铭文“作文祖宝尊彝”。“文祖”是周人对自己祖先的敬美之称。“作”是作器人的名字或族徽。是会意字，从图像上解读，表现人在牧猪。





云南石寨山12号墓出土贮贝器盖上的牧猪图

云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晋宁石寨山12号墓（西汉，前206年—25年）出土的贮贝器盖上有“牧猪”图像纹饰，两男子手持长杆赶着八头猪，与牧羊图呼应。

汉代，养猪的经济效益好，“夫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加上政府的提倡，几乎家家养猪。养猪业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肉食来源，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肥源，而认识肥料的重要性、懂得施肥技术，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猪圈和带厕猪圈模型明器，流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种典型的带厕猪圈设计，注重实用，便于积肥。《齐民要术》：“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农政全书》：“猪多，总设一大圈，细分为小圈，每小圈止（只）容一猪，使不得闹转，则易长也。”指出通过刻意限制猪的行动，来定向培养猪的性状。

灰陶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9.2厘米，宽5厘米，高7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顾册大队出土

灰陶鸡

汉（前206年—220年）
长14.3厘米，宽11.5厘米，高11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顾册大队出土

灰陶狗

汉（前206年—220年）
长10.9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顾册大队出土

灰陶带厕猪圈

汉（前206年—220年）
底径24厘米，通高23.2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顾册大队出土

研究发现我国汉代农业区墓葬中出土陶猪、陶鸡、陶狗等模型器的数量，以猪、鸡、狗按1:2:1比例出现的频率较高，推测这样的规模可能是当时家庭畜产的理想水平。墓葬中模型器的数量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或放大，反映出汉代“理想家园的一般模式和小康标准”。



陶圈

汉（前206年—220年）
通高28厘米，底径24.5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公社支楼大队出土



陶猪圈及陶猪

东汉（25年—220年）

圈长28厘米，宽17.5厘米，高14厘米
猪长12.5厘米，宽5厘米，高7.5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公社顾册大队出土



灰陶带厕猪圈

东汉（25年—220年）

长21厘米，宽22厘米，通高32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唐庄子村出土



绿釉陶猪圈

东汉（25年—220年）

长22.5厘米，宽14.3厘米，通高32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唐庄子村出土

绿釉陶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12.4厘米，宽3.3厘米，高5.5厘米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出土



绿釉陶猪圈

汉（前206年—220年）
长18.5厘米，宽24.5厘米，高17.5厘米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出土



陶子母猪

汉（前206年—220年）

母猪长11.5厘米，仔猪长7厘米

◎ 母猪侧卧哺乳，三只仔猪
吃食，场面温馨。



瓷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5.2厘米，宽1.5厘米，高3.2厘米



红陶猪

东汉（25年—220年）

长16厘米，宽6厘米，高4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西柏店出土



铜小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6.5厘米，宽1.2厘米，高3.2厘米



冷枚《农家故事图》册页

白石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11厘米，宽2.5厘米，高3厘米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汉墓出土



绿釉陶磨

东汉（25年—220年）

长21.5厘米，宽23厘米，高18.5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西柏店村出土



灰陶仓

南北朝（420年—589年）

宽22厘米，高27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唐庄子村出土



绿釉陶灶

东汉（25年—220年）

长26.6厘米，宽17厘米，高20.5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西柏店村出土

绿釉陶井

东汉（25年—220年）

底径12厘米，井架宽17厘米，高33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西柏店村出土



汉代墓葬中常常整套备置包括仓、灶、井、圈厕、院落、楼阁、田地、池塘以及家禽家畜俑等随葬器物，既是对现实中庄园面貌的模拟或憧憬放大，也是对汉代土地制度变化，家庭财产私有化的一种直接反映。

绿釉陶猪圈

东汉（25年—220年）

长31.5厘米，宽17厘米，通高32.5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西柏店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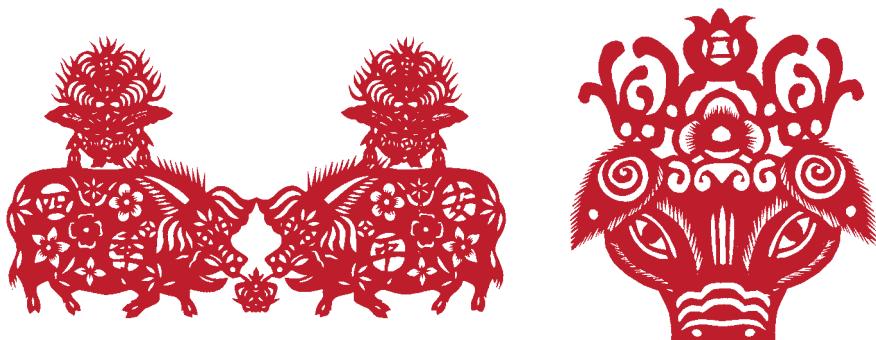
云南保山纸马：六畜兴旺



清代扬州纸马：圈神

圈神

伴随家庭畜牧业的发展，为了寻求对家畜的保护，产生了圈神信仰。通过在饲养牲畜的圈门或墙上张贴神码画，或者焚化纸马祭祀圈神，祈求六畜兴旺。



猪题材剪纸图

3. 瑞兆丰年——肥猪拱门

“猪入门，百福臻。”

——《渊鉴类函》

“当康如豚，见则岁穰。”

——郭璞《图赞》

猪是农家宝，每当除夕夜，有“肥猪”驮着元宝来“拱门”，是作为农业丰收的象征，成为一年起始的美好祝愿！这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瑞兽当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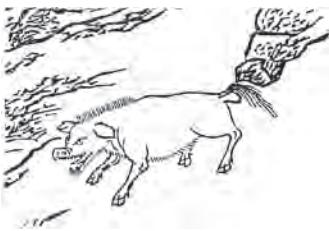
经》：“（钦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当康大穰”为丰收鸣瑞，是农耕时代的渴望。《山海经》里还有洞狌、闻彔等猪形瑞兽。从农业丰收的欢腾喜悦引申到民俗文化中招财进宝、生息繁衍的吉祥寓意，肥猪拱门是瑞兆丰年的祈愿和展望！猪形饰品用于陈列、佩戴、把玩，寓意丰饶、富贵。



“新年多吉庆 合家乐安然”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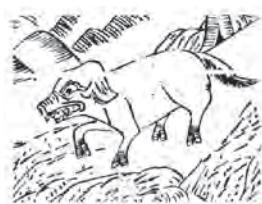
“肥猪拱门”年画



当康 明·蒋应镐绘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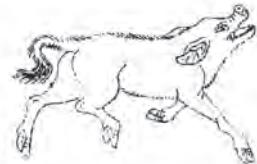
当康 明·胡文焕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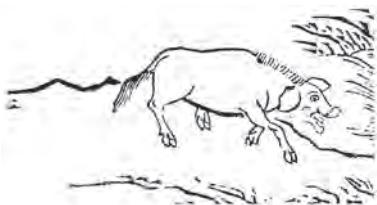
当康 清·四川成或因绘图本

当康

《山海经·东次四经》：“（钦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



当康 清《禽虫典》



狗洞 明·蒋应镐绘图本



狗洞 清·汪绂图本



狗洞 清《禽虫典》

狗洞

《山海经·东山经》：“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珠，名曰狗洞，其鸣自叫。”狗洞是像猪的奇兽，能孕育宝珠。



闻鱗(义) 明·胡文焕图本



闻鱗 清·汪绂图本



闻鱗 清·《禽虫典》

闻鱗

《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几山，有兽焉，其状如彘，黄身、白头、白尾，名曰闻鱗，见则天下大风。”

白玉卧猪

明（1368年—1644年）
长7厘米，宽3厘米，高2.8厘米



白玉猪形佩

汉（前206年—220年）
长5.6厘米，高3.1厘米，厚1.8厘米



铜猪

清（1644年—1911年）
长8.5厘米，宽3厘米，高4.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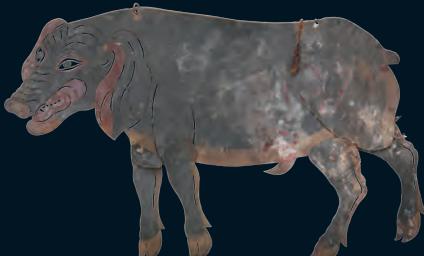
猪头帽

民国（1912年—1949年）
前长14厘米，后长42厘米，帽径17厘米
◎ 民间制作的猪头帽、猪头鞋，寄予孩子们“能吃能睡”茁壮成长的希望，俗称“好养”。猪在民俗文化中象征富贵、吉祥、福气，为孩子制作传统的猪头帽、猪头鞋，寄托着对孩子们新年的美好祝愿。



纸质猪八戒玩具

现代
长11厘米，宽9厘米，高15厘米



皮影猪

民国（1912年—1949年）
长36厘米，高22厘米

二、享豕祈福

春节的节期来自远古的“腊祭”，“腊，岁终祭众神之名”。旧年岁尾、新年年初的古代中国，人们调动起最热烈的情绪和最美好的情感，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祭典和庆典严密地组合起来，共同念感大自然的恩赐，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的庇护，祈福新年“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年节的祭典和庆典，是最富人文精神的民俗礼仪。

“夫礼之物，始诸饮食”。商周时期，祭祀活动的最高规格是以牛、羊、猪合祭，称为“太牢”，只有羊、猪称为“少牢”。直到离我们最近的清代，宫廷还频繁举行着用牲祭祀的仪式。从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俗风情来看，以猪祭祀最为普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绿釉庖厨俑

东汉（25年—220年）
长13.5厘米，宽12厘米，高24厘米
北京市平谷区唐庄子村出土

成都博物馆藏 陶庖厨俑

画像石、画像砖是独具特色的两汉绘画遗产，多见于墓室、石棺、石阙、享祠、崖墓等建筑载体中，总体上属于丧葬艺术的一种类型，表现汉代人的生死观、宇宙观、宗教理念等意识形态。《荀子·礼伦》说：“葬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江苏省睢宁县博物馆藏 庖厨宴饮画像



山东省诸城市前凉台墓庖厨画像

“釜粥芬香饷邻父，阑猪丰脂祭家神。”

——[南宋]陆游《岁末尽前数日偶题长句》

画像上的庖厨图像，描绘人物、牺牲、灶台、厨具、水井等，常与乐舞图、宴饮图配置在一起，极力为逝者营造一个与世俗生活一致，甚至更好更理想的“生活”环境，让逝者在冥间世界永远享有财富、地位和优渥生活。祭祀活动中多用歌舞来娱乐神灵和祖先，庖厨图也可能是为祭祀神灵和祖先灵魂准备祭食场面的反映。庖厨描绘杀猪、宰羊、椎牛、击马、剖鱼等屠宰和炊煮场面，可能包含“肉食者尊”的意识。对祖先的祭奠也饱含着希望祖先庇荫子孙的祈愿。

湖南省博物馆藏 湘潭出土商代晚期豕尊

猪形青铜礼器较为罕见。这件猪尊，从形态上看，已是家猪模样。它的肘部横穿圆管，曾用于贯穿绳索，便于抬动。研究推测，它曾作为“綈”（公猪）的代替物，“與綈从之”，兼贮酒醴，用于祭祀仪式。相比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现文字而言，商代不但有甲骨文，而且甲骨卜辞中有不少是与祭祀有关。“癸未卜，宾贞：燎犬、卯三豕三羊”等与猪有关的卜辞有助于说明上古时祭祀用牲的普遍性。



汉白玉花卉纹神杆墩

清(1644年—1911年)

底长90厘米，底宽70厘米，通高51厘米



得了祭肉供神主前式样图

清代宫廷遵循“堂子祭天”规制，在堂子（神殿）内和殿前院落中举行萨满仪式。院落中的神杆，满语称“唆啦杆子”“索罗杆”，是举行祭天仪式中重要的神具，被认为是人神沟通的桥梁。神杆立于石座墩中，杆上置斗，斗内置牺牲供品，供乌鸦食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还规定，祭祀之牲均用猪，祭祀用猪“必择其毛纯黑无一杂色者”，称为“黑爷”。

青玉握猪

东周（前770年—前256年）
长9.8厘米，宽2厘米，高2.3厘米



玉握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11.9厘米，宽2.5厘米，高3厘米



玉握猪

汉（前206年—220年）
长11.6厘米，宽2.3厘米，高2.9厘米



玉握猪

清（1644年—1911年）
长11.6厘米，宽2.3厘米，高2.5厘米



玉握猪

清（1644年—1911年）
长11.5厘米，宽2.7厘米，高2.8厘米



玉握猪，也称玉豕、玉豚，是汉代至南北朝墓葬中较多见的随葬品。握猪呈方形柱状，采用“汉八刀”的雕刻方法，背部浑圆，腹部平直，一端稍尖为头，身上刻有数条凹线纹，分别表示出猪褶皱的嘴、大大的耳朵、屈曲的四肢等，寥寥几刀，造型生动，尽显时代精神。“握”在手中，不愿逝者空手而去，寄予逝者在另一个世界活得富足的祝愿。也有认为古人随葬玉猪遵循窀穸堪舆，用以守护逝者。

卷之三

家和年丰

第三单元

风调雨顺

约一万年前，人类生活从迁徙向定居过渡，耕种活动开始普遍出现。作物的生长依赖地形、土壤、热量、光照、水等自然条件，适宜的降雨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观察，古人发现猪的某些习性同下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生物学属性看，猪的汗腺不发达，在炎热天气时常常利用水甚至泥秽负身以解酷暑，下雨前的闷热时段更是如此，古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浴猪”。爻辞描写上古迎亲队伍在路上“见豕负涂”，结果遇到下雨。《诗》中描写“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大雨征候。文献中亦有记载通过观测乌云的形状来预测降雨的方法，称为“黑猪过河”。甲骨卜辞里，用猪和羊一起祭祀的对象是云。在古代的祈雨仪式中，猪常用作沟通天地的信物。古人体察天地更进一步将相关联的现象与天文、星占、谶纬等结合，赋予猪属亥、位北、色黑、配坎位、主水的特定符号意义。从新石器时代的猪龙到“豕首鳞身”的雷公，从河伯的化身到理天司斗的天蓬元帅，猪的形象被不断抽象升华，被赋予行雨止雨的神奇力量，寄托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生活希望。

一、豕应天时

上古时，人们仰望星空，通过观测行星和日月在以天极和二十八星宿为背景的天幕中的周年视运动建立起一套时间、空间、气象、物候对应的系统，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在对特定星区的星宿进行观测的同时赋予它们动物象形的梦想，比如“斗星时散精为彘”、“奎曰封豕，为沟渎”，古谚还有“猪乃龙象”的说法。饮食是人类生存、繁衍最基本的要素，定居农业的食物供给依赖精准的时间和适宜的气候，古人认为必须通过持续的祭祀和祈祷，才能保证风雨时若，百稼丰茂。于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往往成为沟通天地的媒介和精神活动的主角。

1. 北斗象征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河姆渡文化猪纹陶钵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尊形器

陶器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遗址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5000年至前4700年。器腹一周装饰生动图案，流云之间绘有一只奔鹿、一只飞鸟、一头生着獠牙的野猪。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认为画面中的图像可以用天文学观点加以诠释。鹿和鸟分别代表中国古代天文学分赤道周天为四宫中的北陆和南陆，而猪是北斗的象征，北斗作为拱极星有与四宫星象相互拴系的特点。他同时认为，河姆渡陶钵的造型如同斗魁，陶钵的一面刻有猪纹，在猪的腹部又刻有显眼的双线圆圈表示天文星饰，象征北斗星；以及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鹰印证了猪、北斗、极星的联系。

僧一行擒纵北斗

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补遗》记录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擒纵北斗的故事，是古代民间对猪与北斗的关联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天咫》中也有相似记录：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家甚殷富，奇一行，不惜金帛，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谓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陨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

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鹰

2. 猪乃龙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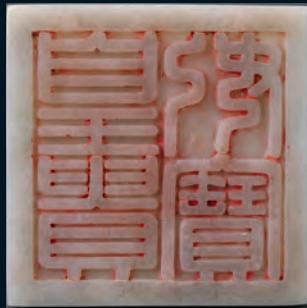
龙，是古人心中的神兽。中国人有崇龙的文化传统，故称为龙的传人。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星象等。近几十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将龙的起源越过青铜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一直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红山文化的龙形玉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发现数量最多、形象最完备的龙形象之一。其数种龙形玉饰的龙头都较多地吸收了猪的形象，如吻部前突上翘、头颈部长鬣飞扬，由此揭开龙的原始形态可能来源于猪，起源于原始文明和原始农业的渊源探索。馆藏的这件贵妃印印钮的蹲龙即保留了猪的形象元素，故宫博物院亦藏有数件相似形制的宝印。

“皇贵妃宝”青玉印

明（1368年—1644年）

长14厘米，宽14厘米，高12.5厘米

◎ 印青灰色玉质，蹲龙钮，朱文篆字刻：“皇贵妃宝”。龙钮简笔刻画，口鼻长圆前伸，双目前视，双耳后抿，头顶一绺鬃毛，形似猪首。龙身似蹲似伏，立于云水之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玉龙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玉猪龙



河南省南阳画像石：河伯出行图

屈原的抒情组诗《九歌》中有一篇《河伯》，有关《河伯》的神话原型的研究争论不断。闻一多先生认为河伯冯夷的原型是猪，认为“冯驩即河伯冯夷，而冯夷实又封豨之转”，即封豨是河伯的化身。

画像上河伯面容的吻部较长、两耳竖起，头上鬣鬃飞扬，显现出猪与龙的渊源转形。他驭龙驾鱼车驰于河海之上，神威赫赫，与《河伯》中“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的河伯出游的文学形象相似，而与《史记·滑稽列传》中“河伯取妇”的河伯形象相异。或因时代的变迁，河伯神话的性质和内容也在悄然变化。从原始农业发展到传统农业，生产和收获对天气的依赖程度始终很高，民间祭河神的仪式一直盛传不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 奎主文章

《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奎星是大猪，主宰大地上的沟渠灌溉。奎星的形象在大都会博物馆藏传明代仇英绘《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上得到印证。不仅如此，唐代《初学记》引《孝经援神契》：“奎主文章，仓颉效象。”顾炎武《日知录·魁》中说“奎为文章之府”，人们立庙祭祀，“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魁星与奎星，使用起来不甚清晰，它们之间的共通点是天文星象与猪形象的关联想象。古人礼奉魁星，更借猪说“题”。相传从唐代开始，新科状元到大雁塔题名时须用“朱笔”。因“猪”与“朱”，“蹄”与“题”谐音，猪成为青年学生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逢考生赶考，亲友们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人“熟题”“朱笔题名”。



大都会博物馆藏 传明代仇英绘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之奎宿



四象白虎中的奎宿



猪首铜车辖及车轘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车轘径5厘米，通长13.7厘米，车辖通高11厘米



虎首铜车辖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首长6厘米，宽5.7厘米，高10.7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黄土坡墓地出土



猪首铜车辖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通高11.5厘米，头长4.6厘米，头宽5.3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264号墓葬出土

◎ 车辖，是车轴两端的销钉，与车轘配合使用。车辖插入轴末端的车轘方孔内，以防车轮脱出。西周青铜车辖顶部多有虎首、猪首等装饰，采用猪首装饰的车辖早期以写实猪首为代表，发展到中晚期仅突出长拱的猪嘴轮廓。

二、出神入化

猪承载着人们截然相反的观念和想象：一方面它被赞美象征丰饶、富贵，另一方面它被诟病懒惰、蠢笨、不净。在佛教里，一方面经典屡屡向世人警戒它是三毒中“痴”（愚昧）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它位列神坛，成为护法菩萨摩利支天的化身，神通广大。摩利支（音译）原为古印度民间崇拜之神，与婆罗门教太阳神和印度教中的猪面人身女神华希拉都有着很深的渊源，后被佛教吸收。猪是摩利支天光明和智慧的象征。

1. 摩利支天

摩利支佛母像，多作八臂三面，面有三目；其中正面为菩萨相，慈眉善目；一侧作猪面，利牙外出，舌如闪电，为愤怒相；一侧作童女相；顶戴宝塔，宝塔内有毗卢遮那佛；正面双手张弓搭箭，其余各手分持金刚杵、钩、线圈、绳索、无忧花，结期克印；或坐于猪身上，或坐于七猪车上。摩利支原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来被佛教吸收，称为摩利支天或摩利支菩萨。摩利支天随佛教来到中国，不仅受到佛教徒的崇拜，还被道教吸收，演变为道教神明斗姆（“北斗众星之母”）。宋代，天息灾（Devasanti）翻译的《佛说大摩利支菩萨经》首次具体呈现了与摩利支天相关的真言及“成就法”（即法术和神变），其中就包括役龙降雨、止雨的能力。



法海寺壁画：摩利支天（局部）

清乾隆款铜泥金摩利支佛母像

18世纪

高17厘米，底长12厘米，底宽7.8厘米

◎此像通体泥金，头戴花冠，顶结高发髻。上身双乳隆起，胸前饰项圈，长链，下身着贴身长裙，骑坐在一猪背上，右手置右腿，左手持无忧树枝。猪趴在单层覆莲座上，张嘴竖目，形象逼真。莲座正面下缘刻有“土观呼图克图诚心金银造”款识。





摩利支佛母像

17世纪

底长18厘米，底宽13厘米，通高22厘米



铜镀金摩利支佛母座

16世纪

长21厘米，宽6厘米，高11厘米

铜镀金摩利支佛母像及坐具

18世纪

通长80厘米，通宽35厘米，高48厘米



2. 雨神



莫高窟二四九窟窟顶西壁西魏壁画

描绘雷神电神风神雨神，画面中的雨神拥有显著的猪的特征。

3. 猪八戒

“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生于亥地，长自乾宫；搭琅地盗了金铃，支楞地顿开金锁。潜藏在黑风洞里，隐显在白雾坡前。生得喙长项阔，蹄硬鬣刚。得天地之精华，秉山川之秀丽。在此积年矣。自号黑风大王，左右前后，无敢争者。”

——[元]杨景贤《西游记杂剧》

“敕封元帅管天河，总督水兵称宪节。”

——猪八戒自述[明]吴承恩《西游记》

“虽然人物丑，勤紧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耙，布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

——猪八戒自述[明]吴承恩《西游记》

猪八戒在《西游记杂剧》中以摩利支天部下的御车将军出场，潜藏黑风洞，自称“黑风大王”。在小说《西游记》中它被描述成掌管天河、精通水性、呼风唤雨并统领八万水兵的天蓬元帅。对猪八戒形象来源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猪八戒的形象特征正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吸收了民间信仰中猪主水，能呼风唤雨的观念。

《西游记》以记述玄奘取经故事的《大唐西域记》为原型，经宋元间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的《唐三藏》《蟠桃会》《净瓶儿》，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演绎和丰满。元末明初的《西游记平话》残本已有朱八戒的形象，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形成取经始末二十四出大戏。明末，吴承恩整理构思成小说《西游记》，经典流传。唐僧师徒为取真经，克服艰难险阻，经历和精神至今为人赞颂！



木版彩印《西游记》图轴

清光绪（1875年—1908年）
每幅通宽 28厘米，通长110厘米

《西游记》画册

清（1644年—1911年）
每册通宽37.5厘米，通长5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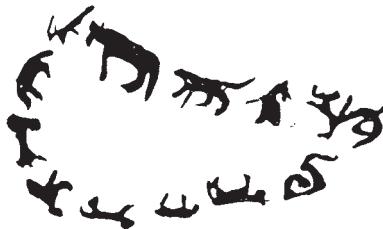
◎ 以唐僧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壁画，曾在榆林 11 世纪西夏洞窟中发现，壁画中仅有唐僧、猴行者和白马。随着《西游记杂剧》、小说《西游记》、宫廷戏剧《昇平宝筏》的不断演绎，从瓷枕到佛寺壁画，从绘本到木版年画，以《西游记》故事为题材的文化创作不断涌现。馆藏的这两组画册，一组是以清代《西游记》戏曲为题材的木版年画，每幅画两个场景，以云朵、殿宇、山石树木等自然分隔，描绘五行山下救行者、高老庄悟空收八戒、三借芭蕉扇、金兜洞大战独角兕、取得真经径回东土等场面；另一组画册画中未见榜题等文字，能辨认出高老庄悟空收八戒、车迟国三圣同妖道斗法、通天河老鼋助力渡河等情节，设色浓艳，山川河流、亭台楼宇、室内陈设刻画生动精细，人物相貌、衣着具有较浓的清代人物画特征。



苍穹顶上，太阳和月亮一年里十二次会合，木星（岁星）围绕轨道环行一周大约十二年，日月星辰绕天极周而复始的视运动，演绎时空的变幻。广袤大地上，谷一年一熟，谷熟称季（年），蕴含了自然、物候的规律和人类生产生活的节奏，一年一岁循环往复。为了记录这个循环，古人经历岁星纪年、太岁纪年的阶段，最终确立使用干支配合形成的六十甲子序数纪年。当十二时兽与地支对应，并被赋予生年、属相的意义时，年年岁岁有了鲜活的表征。猪伴随人类从定居生活开始，与人的关系在家庭、家族、国家层面演进，它的形象走向神坛，它的体圆心逸在民俗文化中成为丰饶、富贵、福气的象征。亥猪作为时间和生命循环周期的界点，是周期循环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流金岁月，人们延续着三千年前的聚宴祝岁，“朋酒斯飨，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一、雕刻时光

生肖依托与地支的对应，更进一步与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周易八卦、阴阳五行对应起来，融入到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体系中，寄予人与自然互动遵循循环生息、和谐圆满的理想。人们把对永恒的信仰、趋吉辟邪的追求寄托到生肖题材的雕刻中。在墓室壁画、随葬品、文玩、摆件、佩戴饰品上广泛使用生肖题材。生肖文化扎根社会生活，人们雕刻时光，寄予生命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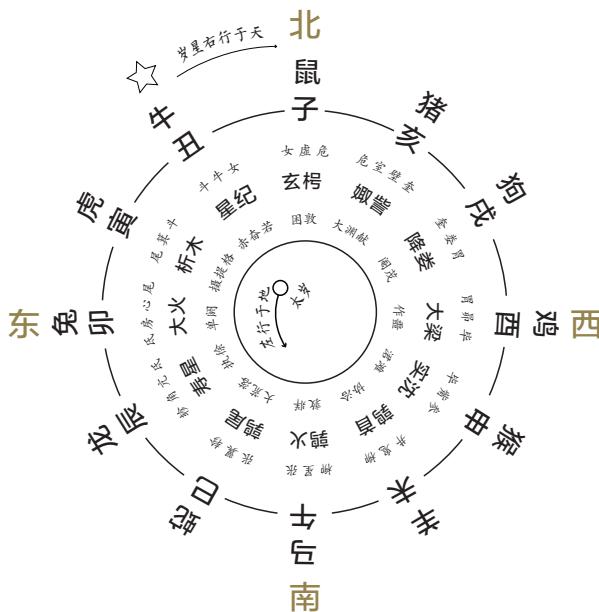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十二生肖岩画



娄叡墓生肖壁画

娄叡墓的十二生肖图案是目前所见最早一例墓室壁画生肖形象。在娄叡墓中，仅见东壁仙人御青龙图像之上，残存牛、虎、兔三种生肖形象，还有残留的鼠嘴图案。



岁星、太岁、生肖纪年示意图

古代人类对时空的构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他们观察到木星视运动的周期大约是十二年，便把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十二次位置以二十八星宿为参照标志。木星每年运行一次，用木星所在星次来纪年。《左传》《国语》中所载“岁在星纪”“岁在析木”等记录，就是用的岁星纪年法。岁星视运动周期实际约11.86年，每过80多年，岁星实际位置将超过理想计算位置一次，与实际天象不符。于是古人假想出“太岁”，“岁星右行于天，太岁左行于地”，以十二地支等分周天。战国时，人们并不用子、丑……称年，而是用“困敦”“赤奋若”等年名。当十二时兽与地支对应，并被赋予生年、属相的意义时，年年岁岁有了鲜活的表征。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生肖纹样从北朝到辽、宋，在随葬俑、墓志、铜镜、壁画等中大量出现。十二生肖俑最初于北朝时在墓葬中出现，到隋唐时是墓葬中最为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十二生肖俑经历了独立的写实动物俑、兽首人身坐姿俑、兽首人身站姿俑、立于人像头顶或抱于人像怀中、人像俑刻字等几个阶段。

十二生肖俑放置于墓圹中的规制见于《唐会要》的记载，“（元和）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九品以上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四神十二时各仪请不置”。“十二时”即十二生肖俑。生肖俑的排列有严格的顺序，置于墓室四角，东、南、西、北各三件，以鼠为始，顺时针方向布置。

十二生肖俑按性质属镇墓神煞类明器，在墓中起辟邪、压胜作用。它们承载时光流转、岁月轮回，依次守护墓主人直到永恒。



陶十二生肖俑

唐（618年—907年）

通高22.5厘米—26.5厘米，宽9厘米—10厘米，
厚11厘米—12厘米



薛府君墓志盖拓片

唐（618年—907年）
长80厘米，宽80厘米
北京市西城区姚家井唐墓发掘出土





十二生肖纹白玉圆镜形镇

清（1644年—1911年）
径5.3厘米，厚0.9厘米



干支纹白玉活心佩

清（1644年—1911年）
高11.8厘米，宽8.7厘米，厚5厘米

铜镜是古人照面饰容的器具。人们把十二生肖同四神、八卦、五行、二十八星宿、瑞兽等多种图像结合起来，使铜镜具有想象中趋吉辟邪的神秘力量。

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

隋（581年—618年）
径16.7厘米，厚0.5厘米



五行八卦生肖纹铜镜

唐（618年—907年）
直径17厘米
北京市西城区郝井台宋太监墓出土
◎ 铜镜中心在象征“土”的半圆钮外，环以池水、树木、火焰、金炉纹饰，用以象征五行；中圈环绕八卦纹饰；往外对应十二生肖动物图案；最外圈对应十二地支。生肖融入了以周易、五行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体系。

瑞兽葡萄纹铜方镜

唐(618年—907年)
边长16厘米, 厚1.5厘米



十二生肖纹二十八宿带柄铜镜

金(1115年—1234年)
通把长25厘米, 径10.2厘米

十二生肖白玉串饰

清（1644年—1911年）

长18厘米，最宽5.5厘米



十二生肖白玉红沁串饰

清（1644年—1911年）

长15厘米，最宽3厘米



十二生肖压胜钱

年代不详

径5厘米—7厘米

◎ 压胜钱是用作吉利品或辟邪物的古钱币，旧称“命钱”，常作为孩子佩带的饰物。生肖是压胜钱的常见纹饰。生肖钱正面是十二动物生肖图案、名称，或配有十二地支文字。背面多以八卦、星官、吉语等相衬。一般认为唐宋以来历代均有铸造生肖钱，尤以清末民国初年为盛。生肖钱戴在身上，保佑平安吉祥，反映了人们趋吉辟邪的愿望。



青玉生肖鼠形佩

明(1368年—1644年)
长2.6厘米, 高1.2厘米



白玉生肖牛形佩

清(1644年—1911年)
长4厘米, 宽1.5厘米



白玉生肖鼠形蛇形马形坠

宋(960年—1279年)
鼠径1.8厘米, 厚0.3厘米
蛇长2厘米, 宽1.5厘米, 厚0.3厘米
马长2厘米, 高1厘米, 厚0.7厘米

白玉生肖马形佩

清(1644年—1911年)
长4.8厘米, 高2.4厘米, 厚2.5厘米



白玉生肖马形佩

清(1644年—1911年)
长4.8厘米, 高2.4厘米, 厚2.5厘米



白玉生肖猴形坠

明(1368年—1644年)
长4厘米, 高3厘米, 厚1.8厘米



墨玉生肖狗形佩

清(1644年—1911年)
长2.4厘米, 高1.5厘米, 厚1厘米



白玉猪形坠

汉(前206年—220年)
长2.7厘米, 高1.6厘米, 厚1.2厘米



生肖溯源

十二生肖的起源，自古就是一个谜题。千年之前的朱熹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对方没能给出明确答复。先辈们努力通过多个视角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致使生肖起源变得说法众多，动物崇拜说、五行生克说、驳五行生克说、天文星宿说、阴阳说、地支与十二禽象形说、时辰与生肖动物习性说等等。十二生肖的配属成型远比文献记载要早，或因多种成因的磨合历变，最终择取了这十二种动物。

据文献记载，宋代理学家朱熹较早注意生肖起源的问题：“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蔡季通答：“相属之说，若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

东汉王充著作《论衡》曾被视为记载十二生肖的典籍源头。《论衡·物势》篇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

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又《论衡·言毒》篇曰：“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龙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龙有逆鳞。木生火，火为毒，故苍龙之兽含火星。”由此，《论衡》在驳五行生克论中，记录下当时十二支与十二禽的完整配合。

然而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竹简《日书》和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简牍《日书》，提供了迄今所知有关十二时兽与地支对应的最早完整记录，说明战国秦代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广为流传十二时兽与地支的配对。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出土的《日书》竹简，有一章专为占卜盗者的相貌特征，《盜者》：“子，鼠也，盜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盜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盜者状，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盜者大面白；辰，（原文脱漏）盜者男子，青赤色……巳，虫也，盜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盜者长颈小耳，其身不全……未，马也，盜者长须耳；申，环也，盜者圆面……亥，豕也，盜者大鼻而票（剽）行，长脊，其面不全。疵在要（腰），臧（藏）于囷中垣下。”

秦汉简牍十二禽与地支对应表

| | 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巳 | 午 | 未 | 申 | 酉 | 戌 | 亥 |
|-----------------|---|---|---|---|---|---|---|---|----|----|----|---|
| 睡虎地秦简 | 鼠 | 牛 | 虎 | 兔 | | 虫 | 鹿 | 马 | 环 | 水 | 老羊 | 豕 |
| 放马滩秦简（甲） | 鼠 | 牛 | 虎 | 兔 | 虫 | 鸡 | 马 | 羊 | 石 | 鸡 | 犬 | 豕 |
| 放马滩秦简（乙） | | 牛 | | | | 鸡 | 马 | 羊 | 石 | 鸡 | | 豕 |
| 放马滩秦简 (乙·黄钟) | | 牛 | 虎 | 兔 | 龙 | | 马 | 羊 | 王口 | 鸡 | 犬 | |
| 孔家坡汉简 | 鼠 | 牛 | 虎 | 鬼 | 虫 | 虫 | 鹿 | 马 | 玉石 | 水日 | 老火 | 豕 |
| 张家山汉简 | | | 虎 | 象 | | | | | | | | |
| 十二生肖 | 鼠 | 牛 | 虎 | 兔 | 龙 | 蛇 | 马 | 羊 | 猴 | 鸡 | 狗 | 猪 |

自东汉至南北朝，人们逐渐将与十二地支对应的动物同人的生年相合，丰富了干支纪年，使生肖成为人们记载生年的生动、简洁方法。南北朝时出现了运用生肖属相的认证，《南齐书·五行志》有文载“东昏侯属猪，马子未详，梁王属龙，萧颖胄属虎”；《北史·宇文护传》有后周宇文护的母亲寄书信对宇文护说，“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的记录。

南朝梁陈时人沈炯按十二地支所配动物创作了《十二属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怀。狗其怀物外，猪蠡宵悠哉。”

晋代的道教思想家葛洪通神仙方术之学，在主要著述《抱朴子》中记录了时兽与地支的对应关系。《抱朴子·登涉》：“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仙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獐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捕贼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成阳公者，狐也。亥日称神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讲述登山涉水时，禁避鬼怪禽兽为害的道法。随着《抱朴子》作为道教经典的传播，十二时兽经葛洪发挥被赋予道家名称，虎为虞吏，兔为丈人，龙为雨师，蛇为社主，马为三公，羊为主人，猴为人君，鸡为将军，犬为宗伯，猪为神君，鼠为社君，牛为书生等等。

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记载：“问曰：‘禽虫之例数多，何故不取麟、凤为属，乃取蚯蚓、蛇、鼠小虫？’答曰：‘取十二属者，皆以其知时候气，或色或形，并应阴阳故也。麟、凤已配五灵，非是虚而不用。’又问曰：

‘麟、凤已配五灵，更不取者，龙、虎亦配，何为复用？’答曰：‘龙动云兴，虎啸风起，此是应阴阳之气，所以须取。麟、凤虽灵，无所作动，故不重用。其十二属并是斗星之气，散而为人之命，系于北斗，是故用以为属。’《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为龙、马，旋星散为虎，机星散为狗，[权]星散为蛇，玉衡散为鸡、兔、鼠，[开]阳散为羊、牛，摇光散为猴、猿。’此等皆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也。”萧吉认为汉文化流行的十二生肖之所以会选取这十二种动物，主要源于天文星象及阴阳之气。

佛教经典《法苑珠林》中唐代名僧释道世曰：“此之十二兽，并是菩萨慈悲化导，故作种种人畜等形，住持世界令不断绝。故人道初生，当此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是故汉地十二辰兽依次而行不异经也。”把昼夜十二时的循环流转解读为十二时兽轮流巡行教化——子时，鼠巡行教化；丑时，牛巡行教化；寅时，虎（狮子）巡行教化……到亥时，猪巡行教化。

宋代，洪巽在《旸谷漫录》中根据十二生肖动物爪或舌的数量提出奇偶排序之说，认为鼠、虎、龙、猴、狗为五爪，马为单蹄，奇数为阳。牛、羊、鸡、猪为四爪，兔两爪，蛇两舌，偶数为阴。十二支分阴阳搭配，生肖动物依次排序而成。清代梁章矩在《浪迹丛谈》中沿用了这种观点。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根据生肖动物习性及其活动特点，提出了动物活动排序的说法，一天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中哪种动物活跃最具代表性，该动物即为所在时辰的代表。

到现代，郭沫若著《释支干》，从甲骨文的字形、声韵入手，联系天文星宿对生肖起源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解读十二生肖因与地支含义对应配合而逐渐形成。

十二生肖的形成当是古代人类对天文星象和自然崇拜长期发展认识的成果，生肖里包含六畜，表明动物的选取与农业社会背景下人们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密切相关。人们把对天象的观测，对自然的认识，同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智慧融合起来，把美好的祈盼和吉祥的愿望寄托在瑞兆新年的动物身上。

二、方寸天地

生肖邮票是以十二生肖动物图案为主题设计的贺年邮票，方寸间尽显丰富的设计、色彩和寓意，传达中国传统审美中生肖代表的吉祥、和谐和对新年的祝福。



“养猪”邮票，1960年发行

由刘硕仁设计，全套5枚。新中国成立后，党制定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建设方针，为整体农业的综合发展确立了目标和方向。群众性的养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养猪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养猪不仅增加了养猪户的收入，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国民食物构成，增进了国民体质。为庆祝养猪取得的成就，原邮电部发行“养猪”特种邮票，编号特40，以“繁殖”“防疫”“肥猪满圈”“猪食堂”“猪肥仓满”为主题，在色彩、构思和表现方法上吸取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版画艺术的效果，生动逼真、趣味性强，见证了时代大事。



癸亥猪年生肖邮票，
1983年发行

由韩美林画，卢天骄设计，全套一枚。图案是一只造型活泼可爱的小猪，探首、翘嘴，身体图案极富民间美术装饰特色。



乙亥猪年生肖邮票，1995年发行

由吴建坤、杨文清设计，全套两枚，以“肥猪拱门”“喜迎新春”为图案。第一图选取独特视角，将小黑猪拱肩、探首、耸鼻、翘嘴等关键拱门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表现“肥猪拱门”的吉祥寓意；第二图以橘红底色为衬，在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窗格里，书白边黑色隶书“猪”字，洋溢着“喜迎新春”的欢快、祥和。



丁亥猪年生肖邮票，2007年发行

由陈绍华设计。图案为一戴着头巾、披肩，憨态可掬的猪妈妈用慈祥的目光看着猪宝宝的温馨画面。子母猪是传统的创作题材，以母猪哺育仔猪为基本构图，邮票图案创作增加了嬉戏场面，更加喜庆、生动。



己亥猪年生肖邮票，2019年发行

由韩美林设计，一套两枚。第一图名为“肥猪旺福”，肥猪肚藏乾坤，憨态可掬，以奔跑的动态表现灵动生风的质感，象征着奔向美好生活；第二图名为“五福齐聚”，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同时出镜，其乐融融，体现出“全家福”的概念，也寄托了新春时节合家团圆、五福临门的美好祝福。此轮生肖邮票提炼出“家”的核心概念，使生肖的形象特点与中华传统家国情怀巧妙结合，赋予了生肖邮票“合家欢”的生动设定。

结语

家和年丰

两千年来，每当有新生命诞生到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都会获得一份雕刻着时光和信仰的礼物——生肖。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共同想象，承载着对未知生命的渴望和理想，见证着人和天地互动的辩证思考，和追求万物和谐的终极目标。如果说有豕有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对洪荒的跨越，家和年丰是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千年传承，那么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则是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文化基因！辞戌迎亥，盛年不重来，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 首都博物馆编.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2-5302-8

I. ①家… II. ①首… III. ①十二生肖－猪－文化
IV. ①K8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4352号

首都博物馆编纂委员会

主任: 郭小凌

副主任: 白杰 韩战明

委员: 靳非 齐密云 黄雪寅 杨文英

杨丹丹 龙霄飞 彭颖 齐政

鲁晓帆 刘绍南 黄春和

编辑: 孙芮英 张健萍 杨洋 裴亚静

杜翔 龚向军 李吉光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责任编辑: 俞伽 战文婧

特约编辑: 杨洋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苇子坑138号

邮码: 100079

电话传真: 86-10-65240430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35 1/16

字 数: 80千字

印 张: 4

版 别: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2-5302-8

定 价: 68.00元